

【发表論文】

日本社会对金玉均流亡日本的认识与应对

韓 成敏

(原文为韩文, 翻译: 朴 贤)

1 前言

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在甲申政变（1884）失败后流亡到了日本，而这些人近代日本所接收的第一批政治流亡人员。此后，“金玉均引渡问题”一直是朝日清三方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争议点，金玉均本人的活动也成为了主要关注事项。金玉均的在日待遇由日本政府的最高决策机关——内阁会议（简称“阁议”）来决定并施行。因此，研究金玉均流亡后活动，对理解甲申政变以来的韩日关系或东亚国际关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金玉均流亡后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史或外交史等领域，比如朝鲜政府和日本政府围绕引渡问题所产生的交涉与纷争、查明1894年金玉均暗杀事件的幕后等。

而关于日本社会首次接收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者以及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应对本身，则较少受到关注，即便有也仅仅停留在介绍与金来往的名人逸事的程度。本文将对日本社会如何认识并应对以金玉均为中心的朝鲜政治流亡者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2 金玉均的日本流亡

政变失败后，金玉均、朴泳孝等激进开化派选择流亡日本，并于1884年12月13日抵达长崎，但日本政府并未立即向公众公开他们的流亡事实。作为甲申政变的后续措施，日本政府预先准备过对朝及对清交涉事宜，所以刚开始日本官方否定了开化派流亡日本一事¹，并制止媒体对其进行报道。

日本媒体首次对甲申政变进行报道是在15日，但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关报道并未提及金

¹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七，第351页。

玉均的流亡或日本与甲申政变的关系等²。这种言论刺激了日本社会反朝、反清的情绪，使其对金玉均及开化派产生同情心理，例如称开化派为“日本党”等。但与这种舆论不同，对想回避甲申政变相关责任的日本政府而言，流亡日本的开化派人士成为了其政治负担。金玉均等人流亡之初的生活，是通过福泽谕吉等岛内友人的资助来维持的，而原本寄予希望的日本政府却分文未出。于是在1885年5月，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听从福泽谕吉的劝告越洋至美国³，而金玉均则继续留在日本揭露甲申政变当时日本政府的介入，同时撰写《甲申日录》回顾政变的整个过程。

随着《汉城条约》的签署，朝日之间关于甲申政变责任问题的争执也告一段落。但在条约签署以后，朝鲜政府一直延续了对金玉均等流亡者的引渡要求。对此日本政府宣称，因其与朝鲜未签署《犯罪人引渡条约》，加之流亡者是国事犯，所以不能按照万国公法引渡相关人员，从而回绝了朝鲜政府的要求⁴。

3 流亡初期日本社会对其认识与应对

在引渡要求屡屡受挫后，朝鲜政府采取了最后手段，即派遣刺客。起初，张浚奎（张甲福）、池运永等刺客的暗杀计划因金玉均等人的策略而失败。之后于1886年6月1日，金玉均致函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求其保护人身安全，但日本政府却回函命令金玉均离境。

日本政府此举完全在金玉均的意料之外，他立即把住处迁到了横滨这一治外法权区域以躲避日本警察势力，并通过驻日外交使团展开自救运动。当时正逢日本在东京主办列国会议，要修改之前的对日不平等条约⁵。金玉均试图利用日本备受世界瞩目的这一机会，炒作自身面临的困境，使其在国际上得以舆论化。在此情况下，井上馨于6月7日向驻朝临时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传达了以下训令：

金（玉均）正想动员所有证据，通过裁判程序，正式要求日本政府的保护。他若得逞，事态会变得很严

² 《时事新报》1884年12月18日、《朝野新闻》1884年12月23日社论。

³ 《时事新报》1885年5月28日。

⁴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八，第122-125页。

⁵ 修改条约的列国会议从1886年5月至1887年4月共进行了28次会议。（日本国籍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明治时代》，有信堂，1957年，第208页。）

重……政府会尽快安排让金（玉均）离开日本领土。但是金（玉均）在几个外国人的帮助下，仍想提起诉讼。在此情形下，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池运永离开日本。请你向朝鲜政府通报这一情况，并以你个人名义建议朝鲜政府向池运永发出电报，劝告池运永立即离开日本。⁶

可见，日本政府为了提前封锁“金玉均暗杀未遂事件”在列国会议期间被舆论化，想让池运永回到朝鲜。日本政府请求朝鲜政府向池运永发出回国命令，而在他拒绝这一命令之后，日本政府于23日将他强制遣送朝鲜⁷。另一方面，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于11日向金玉均下达了官方离境命令⁸。

不过，日本似乎并不愿意真正将金玉均逐出国外。外务大臣井上馨在6月2日命令金玉均“国外退去”（离境）的同时，却明言“不可像李鸿章等人要求那样，逮捕金玉均并引渡至清国或朝鲜”⁹。同时，日本政府无法容忍金玉均一直待在东京。因为如此一来，朝鲜会继续暗杀行动，而这又会对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一事带来不可控的风险。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很好地体现在栗野回复朝鲜政府引渡要求的信函上：

政治犯引渡问题应遵循国际法。通常在两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就不会引渡犯人，更不能引渡政治犯。如果引渡金玉均，日本政府有可能在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上遇到困难。¹⁰

日本政府当时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非常重视施行西方化政策，希望西方列强承认日本是文明国家。如果在日本国内发生暗杀政治流亡者的事件，很容易在国内治安及相关问题上给西方列强提供口实，而这是日本政府极为忌讳的。

离境命令其实是为了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岛的一个借口。此时的日本政府既不能将他留在东京，也不能驱逐出境，从而选择的应对方法就是流放。但金玉均在名义上是流亡者，也没有违反日本法律，

⁶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九，第556页。

⁷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九，第567-569页。

⁸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九，第574-575页。

⁹ 濂川义信《日本近代史上的流亡者问题》，《韩日关系研究所纪要》10-11，岭南大学韩日关系研究所，1981年，第169页。

¹⁰ 国史编纂委员会藏缩微胶卷NO. 03059，MT1124《栗野慎一郎复命书》，00430~00431。

因而没有名分将其进行流放，所以违反离境命令就会为其提供借口。7月份，日本政府就把对金玉均的处理方针从离境转为流放小笠原¹¹。山县有朋向警视总监和小笠原岛出张所长发送了训令，极为详细地规定了对金玉均的待遇事项。从此，金玉均的流放生活就按月向内务省及外务省进行报告。

关于金玉均在小笠原岛上的生活，记者会在每次定期航班时乘船至岛采访，日本社会可以通过报纸对其进行了解。他的岛上生活毫无特殊之处，主要是以读禅书和下围棋来度日¹²。小笠原岛的气候闷热潮湿，影响了金玉均的健康状况。因此，金玉均曾持续向山县要求迁移至别处，山县却完全不予理睬¹³。

可是到了1888年，局势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担心金玉均与日本国内反政府势力进行勾结，朝鲜方面又有迹象表明在酝酿新的暗杀计划。新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由此判断，还不如把金玉均转到近处，监视起来更为方便。于是在同年8月，金玉均被转移到北海道的札幌¹⁴。

4 日本对清政策变化与金玉均重返东京

金玉均于1890年回到了东京。根据内务大臣西乡从道的提案并经过阁议决定，在11月21日解除了对金的流放命令。西乡提出的解除流放理由为，金玉均与在野党的勾结、来自朝鲜的刺客等风险已经不复存在，另有金玉均的身体需要治疗等¹⁵。不过笔者认为，实际上日本政府允许金玉均转居内地却另有其因。

在小笠原岛流放期间，金玉均曾多次要求搬至东京，但其要求屡屡被日本政府拒绝，最后也只是转到北海道而已。而关于朝鲜派刺客的问题，驻朝临时代理公使近藤真锄从1889年金玉均第一次转居东京

¹¹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九，第582-583页。

¹² 金玉均在小笠原岛上无人可以交流，所以常以岛上的孩子们为伴。后来随行至上海的和田延次郎就是其中的一个少年（闵泰瑗《甲申政变与金玉均》，国际文化协会，1947年，第82页）。另外，刘赫露（音译）会乘坐每三个月一次的定期航班来岛，向金报告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当前局势，并拿走受托索取的金氏墨迹。1887年，本因坊秀荣来岛安慰金玉均，与他共渡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¹³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九，第584-586页。

¹⁴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二，第427-428页。

¹⁵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三，第335页。

时起，就警告过行刺的可能性¹⁶。再者，金玉均与民党勾结的可能性也并未得到消除。

从金玉均移居内地到他前往清国之前的这一时期，正好与日本第一议会至第五议会的时期相吻合。当时，日本政府和民党正围绕“海军扩张”“民力休养”“修改条约”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日本政府是在金玉均相关的政治及外交风险仍旧存在的情形下，突然转换态度，允许其移居内地。当时的日本报纸将这一举措报道为“自由解放”，但日本政府对金玉均的监控政策从未改变，并作为保密文件来进行报告¹⁷。

这表明，日本政府由惧怕金玉均惹事的消极立场转向了积极应对的方向。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若清国或朝鲜试图暗杀金玉均，日本政府要将其反制利用为与清国的发起争端的口实。而对内，若与其对立的民党势力利用金玉均来攻击政府，当局则可以以此为借口，像“大井宪太郎事件”时那样镇压民党。或许这才是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

5 金玉均暗杀事件与日本对清开战的舆论制造

居住及活动自由得到认可之后，金玉均就回到了东京，而朝鲜政府的暗杀活动也重新展开起来。金玉均暗杀事件的策划人李逸植的渡日时间为1892年4月9日¹⁸。他召集了权东寿、权在寿、金泰元、川久保常吉以及在上海的具体实行人洪钟宇等同谋，开始接近流亡人士。据和田的证词，当时金玉均已经识破了李逸植、洪钟宇等人是刺客。但是他想通过他们来筹集渡清旅费，以便与李鸿章进行谈判。而李逸植等人则按金玉均的渡清行程拟定了暗杀计划。

因渡清路险象丛生，朴泳孝和头山满等友人极力挽留了金玉均，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在甲申政变以来，曾深信为同志的福泽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却急速转变为国权论者，而日本政府则瞄向对清战争，持续扩充军备力量。甚至在1890年的帝国议会上，内阁总理山县有朋发表了“主权线·利益线”之演说，公开表明要在韩半岛实现日本的利益线。1894年的日本社会被日益膨胀的对外扩张诉求所充溢。鉴于日本社会的这种动向，渡清之行对金玉均来说是势在必行，哪怕要面临巨大的危险。向上海出发前

¹⁶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二，第428-429页。

¹⁷ 内务当局完全掌握了金玉均的动向，尤其是这些文件均用毛笔写上了“秘”字。（琴秉洞《金玉均与日本：其留日轨迹》，绿荫书房，1991年，第703-704页）

¹⁸ 古筠金玉均正传编纂委员会《李逸植预审案件记录》（收录于《古筠金玉均正传》），电矿产业社，1984年，第473页。

一天，金玉均跟宫崎滔天有过一次谈话，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他是以何种姿态面对此次上海之行的。

人间万事都是命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使这是李鸿章的诱捕之计，我也乐于奉陪。我乘船是冒着被俘的想法，哪怕到那里马上就死也无所谓。（即使有）五分钟的谈话时间，那也是属于我的。不管如何，一个月（以内）问题就会有定论¹⁹

1894年3月23日，金玉均向上海出发²⁰。此时的渡清人员构成是随行人员和田、翻译吴葆仁（驻日清国公使官员）以及刺客洪钟宇三人。金玉均于27日下午抵达上海，并在次日（28日）下午三点左右在东和洋行的客房被洪钟宇枪击身亡。他的死是由东和洋行主人吉岛德三向租借地警察当局即工部局警察部报案的，而吉岛曾受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大越成德之命负责监视金玉均的一举一动²¹。

金玉均死亡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清日三国政府，三方的应对均为迅速。其中，日本政府在处理事件过程中的行动最为迅捷而周密。早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多月，日本政府就已通过驻香港日本领事中川恒太郎的报告知晓了这次的暗杀阴谋。日本外务省收到这份报告是在2月10日。考虑到事情的特殊性以及以往金玉均相关措施均由阁议决定的惯例，暗杀计划肯定是报告给了日本内阁，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日本政府是不是坐等金玉均的死讯。

在金玉均遇刺前一天的3月27日，陆奥曾致函驻英公使青木（前任外务大臣），而此信件可以很好地反映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陆奥在信中提到，“如果不是能震惊国民的大事件，则不能稳定民心，但又不能因此发动战争，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修改条约”以此透露出日本政府的艰难立场²²。

日本开设国会以来，政府与议会间的对立在1894年达到了顶峰。但是议会为减轻地租和缩减军费做的斗争，在明治天皇的一句“建舰诏敕”之下化为乌有。此后，从议会谴责政府软弱的对外政策以及主张扩张国权来看，两者在本质上不存在对立。可是政府压制议会使其无法进行充分发言，并无故停会乃至解散议会的行为，使得反政府情绪从议会扩大到一般民众。在1894年3月份的众议院选举，民党仍占据

¹⁹ 河村一夫《李鸿章与金玉均的关系》，《日本外交史上的诸问题》，南窗社，1987年，第14页（二次引用）。

²⁰ 《时事新报》1894年3月27日。

²¹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之一，第487页。

²²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一）》，每日新闻社，1974年，第166页。

着优势。日本政府领导人为了摆脱国内困局，突破政治危机，从而转向了发动战争²³。

日本从甲申政变以来一直在增强其军事力量，具备了一定的开战能力，只需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以防止因其发动“毫无理由的战争”而受到内外谴责。上述外务大臣陆奥的信函透露的是日本政府当局者的内心想法²⁴，而次日就从上海传来“金玉均被害”的电报²⁵。

28日，日本政府在收到暗杀消息之后，立即通过驻朝公使大鸟向朝鲜政府及袁世凯传达这一消息。朝鲜政府则与袁世凯协商，并与其就引渡金玉均尸体一事达成协议。29日，经过验尸的遗体被引渡给了和田，洪钟宇则被起诉到会审衙门。直到这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并未反对和田将遗体运回日本。但是领事馆的方针很快就被来自本国的训令所改变。当天，外务大臣陆奥向大越下达训令，“不管是否有任何日本人牵连此事，领事绝对不能对其进行过度的保护”²⁶。31日，又有新的训令下达，“竭尽全力阻止金玉均的尸体进入日本”²⁷。由此，和田想把金玉均遗体移送至日本的努力，因为领事馆的阻挠而受挫。

最终，金玉均的遗体和洪钟宇由清国军舰威靖号带到了朝鲜，并于4月14日引渡给了朝鲜政府。当夜，金玉均的尸体在杨花津凌迟处斩，脖子上挂了“今不待时于杨花津凌迟处斩谋叛罪人大逆不道（金）玉均”的木牌²⁸。

我们观察金玉均遇害之后的三国应对过程，就可以发现朝鲜与清国从一开始就处于合作关系。更不容忽视的是，其实日本政府已经事先掌握了暗杀金玉均的准确信息，且在暗杀事件中全程向朝鲜和清国提供情报，使两者进行合作。最为积极利用暗杀这一盘棋的正是日本政府。

金玉均遇害消息从3月30日开始一齐通过报纸向日本社会报道²⁹。之后，日本各家报社对此进行了维持数月的大力报道，本次暗杀事件对日本国民的冲击相当大。初期大部分舆论主要集中在对金玉均遇害的哀悼。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舆论导向也发生了变化。从4月5日起，十五家报社联合发起了纸上运

²³ 信夫清三郎，上述著作，第150-166页。

²⁴ 藤原章著、严秀铉译《日本军事史》，时事日本语史，1994年，第101页。

²⁵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之一，第484页。

²⁶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之一，第486页。

²⁷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之一，第495页。

²⁸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之一，第507-509、506页。

²⁹ 《时事新报》、《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1894年3月30日。

动，开始募集“金玉均追悼义损金”³⁰。为期三十天的这次募集运动，在日本社会也是史无前例的，足以把追悼金玉均扩散为一次全社会的运动。

在这次运动过程中，从朝鲜传来了将金玉均的尸体凌迟处斩的消息，进而涌现了大批刻画朝鲜政府野蛮性的报道³¹。报纸上的论调也逐渐从哀悼转变并发展为对朝鲜和清国野蛮行为的谴责³²。同时，自诩为金玉均故友的头山满等在野的对外强硬派，成立“金氏友人会”，展开起大规模的追悼活动。舆论逐渐倒向要求以文明之力惩罚野蛮势力，即要求对清开战。

对于事态的发展，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放任。当时，制造反朝反清舆论的代表性报纸有福泽的《时事新报》和《东京日日新闻》。《时事新报》已于1885年的福泽谕吉《脱亚论》为契机，坚持着对外侵略论的立场。《东京日日新闻》则是明治政府的机关报³³。这说明，日本政府通过媒体将金玉均暗杀事件利用于对清开战的舆论制造。

5月1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中，批判了政府对金玉均暗杀事件的应对方式，并主张对清国要不惜开战。31日，众议院批判政府的弱势外交，并表决了《内阁弹劾上奏案》。在此之前的20日，由金氏友人会主导、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及全国82家报社代表担任葬礼委员的“金玉均葬礼”，在东京隆重举行³⁴。与此同时，以金玉均暗杀为主题的舞台剧席卷了日本文化界，其内容包括对朝鲜及清国暗杀金玉均的谴责和惩罚³⁵。

葬礼第二天，的野半介作为玄洋社代表拜访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并主张与清国开战。川上的回答是，“伊藤首相是持非战论的中心人物，所以想打仗不太现实”。但又很快改口说，“有没有点火的人呢。一旦有火苗被点着，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了”³⁶。就这样，日本政府没有公开出面制造对清开战舆论，只是表现出了迎合并跟随舆论趋向的姿态，这是日本政府在清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一贯方针，是出

³⁰ 《时事新报》1894年4月5日。

³¹ 《东京日日新闻》1894年4月18日；《时事新报》1894年4月18、24日；《国民新闻》1894年4月29日。

³² 《东京日日新闻》1894年4月17、20日；《时事新报》1894年4月24日。

³³ 松下芳男《日本军制与政治》，室潮出版，1960年，第211-218页。

³⁴ 《时事新报》1894年5月22日。

³⁵ 琴秉洞，上述著作，第867-868页。

³⁶ 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玄洋社社史》，1917年，第435-437页；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房，第143-144页。

于防止西方列强借机干涉的考虑³⁷。此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已一致主张对清开战。不过，其实舆论的强硬论和开战要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日本舆论界，对于清国的一般强硬论调转变成具体开战要求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正是金玉均暗杀事件。

在国内舆论得到统一的基础上，日本迅速开展了战争准备。参谋总部已从5月下旬开始着手准备输送朝鲜派兵，于6月5日设置了战时大本营，次日（6日）收到清国派兵消息后立即向朝鲜派出军队。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得以重新签订。这意味着西方列强干涉清日战事的可能性得以排除，日本政府最后的顾虑得以消失³⁸。由此，在国内外多种利好之下，日本于23日占领了朝鲜的景福宫，清日战争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结语

金玉均流亡后的待遇，随着日本政府的对朝及对清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流亡初，日本政府为了回避在甲申政变中的相关责任而否认了开化派流亡日本的事实本身。随后，《朝俄密约》的签订和巨文岛事件又使朝鲜成为了列强争利的竞技场。在甲申政变之后，日本丧失了朝鲜问题上可以直接牵制清国的力量，便将金玉均引渡问题当作一致对清的协商筹码。但同时，日本又担心朝鲜所派刺客和岛内反政府势力与金玉均的联系，因为这有可能会给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带来不利影响。在当时，修改条约是日本政府首当其冲的重要议题。日本既不能将金玉均驱逐出境，也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国内，从而将他先后流放到小笠原岛和北海道。

1890年以后，随着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金玉均重新获得了活动自由，但对他的监控却一直持续下去。这可以被视为，日本对金玉均的态度从尽量避免让其成为朝清日三国外交纷争因素的消极立场，转变为积极利用其价值的积极立场。最后，日本利用金玉均暗杀事件统一了国内舆论，使其一致主张对清开战，还获得了对外开战的名分。

³⁷ 陆奥宗光著、金承日（音）译《蹇蹇录》，泛友社，1993年，第36页。

³⁸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之一，第113页。